

从“辉煌三十年”看法国争取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 吕一民

“辉煌三十年”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让·福拉斯蒂埃首先提出的表述。他认为，法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持续不断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取得令人赞叹的发展和成就，迎来“光荣”或“辉煌”的三十年。

纵观法国整个现代化历程，类似这样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黄金期极为罕见。也正因有了“辉煌三十年”取得的发展和成就，整个法国的现代化国家建设才得以完成。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速度可谓是“领跑者”之一，超过美国、英国等国家，与同时期也经历“经济奇迹”的联邦德国大致相当，仅落后于日本。“辉煌三十年”贯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1946—1958年）以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早期。造就“辉煌三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戴高乐担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大力推行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戴高乐主义，在经济发展领域集中表现为强调法国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反对美国的经济霸权。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快速恢复战后经济

由于存在政治制度弊端等问题，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一直在不少法国人心中名声欠佳。尽管如此，它存续12年里也取得过不少成就。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迅速恢复受到二战重创的国民经济，然后又通过推行计划化，让战后法国迈上快速发展道路。在法国“辉煌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的“莫内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美国面向欧洲推行的马歇尔计划为法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法国重建基础设施、恢复生产、改善民生，为法国的经济复苏带来了重大机遇，也为“辉煌三十年”前期法国经济外交等方面受制于美国埋下了伏笔。“莫内计划”便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因计划制定者让·莫内而得名。让·莫内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计划总署首任署长，上任

后成功主持制定了1946年《现代化与装备计划》即“莫内计划”。该计划原定为期五年，后为了配合马歇尔计划又延长至1953年。该计划的出台主要是为了应对法国当时面临的三个紧迫要求：确定战后重建方针、协调各公共部门的运作、分配马歇尔计划中的援助物资。

经过几年努力，“莫内计划”确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在此基础上，法国又开始实施“第二个计划”（1954—1957年），使法国经济在50年代中期继续得到迅速发展。1955年底，以法国靠地中海一带特有的冷风——“密斯脱拉风”命名的高速列车在巴黎—马赛的铁路线上启用，其平均时速堪称当时世界之最。毋庸讳言，这项“世界之最”既及时反映了法国当年在交通运输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同时也是当时法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的重要标志。

不过，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存续12年间，基本上是在执行迎合美国需要的大西洋政策，不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都在依赖和迎合美国，在经济快速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法国前总理顾夫·德姆维尔曾这样论述法国当时与美国的关系：“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控制了法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在财政上依赖美国——马歇尔计划；我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北大西洋公约。”因此，法国如何争取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真正造就“辉煌三十年”，便成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留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早期：反对美国经济霸权，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

“辉煌三十年”的高光时刻还属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早期，尤其是戴高乐担任总统时期（1959—1969年）。法国能在当时实现新的经济腾飞，确实也极大归功于戴高乐。在强调独立自主的戴高乐主义引领下，法

国通过自立自强发展本国经济、反对美国经济霸权，确保法国现代化建设行驶在自主可控的快车道上。

随着法国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战后法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但是美国资本大规模进入法国，法国的美资企业明显增多，让戴高乐深感不安，于是他便公开提出谨防“法国经济的殖民化”。在这一口号下，法国展开了以限制美国资本输入为目的的运动，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尽量摆脱美国资本的控制。其间，法国政府当局通过各种手段甚至直接出面，限制美国资本渗入和控制法国的一些重要公司。例如20世纪60年代前期，正是由于法国政府的直接干涉，致使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购买法国波尔机器公司股票的计划功亏一篑。

同时，法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与管理。戴高乐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高度重视发展国民经济，明确宣称：“今天任何时候都一样，使国家强盛是政府的责任，而国家今后能否强盛则取决于经济。因此，必须领导经济。”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大力推行国有化企业发展经济。时至1968年，法国国有化企业资本已占全部资本的三分之一，国家资本控制达80%以上的行业有电力、通信、煤与天然气等，控制达40%—80%的行业有航空、汽车、军火、矿业、运输、焦炭和自动化设备等。这些举措无疑对推动法国民族经济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法国还通过利用自身在欧洲共同体市场的主导地位扩大对外贸易，不断弱化美国对法国的经济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法国政府发动了支持出口运动，使法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额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四大贸易国。其间，欧洲共同体市场这一由法国占据较大主导权的平台，为法国出口尤其是农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许多便利。1958—1973年，法国对欧洲共同体的农产品出口额增长了17倍。同时，欧洲共同体用于津贴农产品出口和支持农产品价格的保证基金，则很大比例落入法国。这有力促进了法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同

时，日益发展壮大的欧洲共同体市场也使得法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逐渐降低。

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应用是法国“辉煌三十年”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在此期间，法国格外注重加强科学研究、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及时引进。1959—1969年，法国政府拨出的研发经费从30亿法郎增加到138.6亿法郎，国家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从1958年的1.2万人增加至1968年的4万多人。因此，这一时期法国凭借自身雄厚科研实力，不断取得蜚声国际的重大成果，时有法国学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等奖项。在大力发展本国科研同时，法国政府亦积极推动技术引进工作。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法国在工农业生产中大量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有力促进了法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让法国现代化在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护航下稳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辉煌三十年”期间，戴高乐当选总统后就加快了法国航天事业的发展。1965年11月26日，法国以其家喻户晓的漫画主人公“阿斯特里克斯”命名的首颗人造卫星完成太空航行，标志着法国正式加入首批太空强国的行列。

总之，“辉煌三十年”是法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极为少见的持续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从二战后依赖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到逐步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蜕变，自立自强最终造就了法国“辉煌三十年”的高光时刻。而这一阶段取得的发展成就，既让法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还使其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使法国不仅成为当时西方诸国中唯一敢对美国说不的国家，还能充分利用处于东西南北各集团和国家交汇点上的有利战略位置，力求充当“仅次于超级大国的大国”。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秦汉以来的中国历代王朝，均高度重视并致力实现广阔疆域下的边疆有效治理。历朝都设有机构或者官职负责民族和边疆有关事务，如秦设“典客”、汉设“大鸿胪”、隋唐设有“鸿胪寺”等。但是，由中央设置专职机构，并向各地派员，同时统筹协调各方面关系，形成一套纵横一体的系统边疆治理机构和机制，则以清代的理藩院最为典型。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门”，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崇德三年（1638年）更名理藩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称理藩部。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边疆和民族事务的主要机构，并承担一定外交职责，在清代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如身使臂，贯通从中央到边疆基层的治理体系。清入关后，随着边疆事务拓展，理藩院的机构体系也逐渐完善。康熙初年，中央政府认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将其由礼部所属，调整为“官制体统与六部相同”，“理藩院尚书銜名列于工部之后”，这就从中央层面使理藩院有了与“六部”的平等地位。理藩院设尚书、侍郎等职，分旗籍司、王会司、典属司、柔远司、徠远司、理刑司六司，至乾隆二十七年成为定制。为便于协调各方处理边疆事务，常由“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

同时，理藩院还设有蒙古翻译房、满档房、汉档房、唐古特学、托忒学、蒙古官学、俄罗斯馆、喇嘛印务处等专门办事机构，为中央政府面向边疆群体开展工作提供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支持保障，也有助于强化对重要领域和事务的管理。此外，理藩院在边疆地区还有大量派出机构或人员，掌管驿站、税收，参与处理民贸易及交涉等事务。更为重要的是，理藩院兼理刑名，凡涉边疆地区的法律，由理藩院会同制定。在司法运作中，边疆地区重案要案或案情复杂的，可全案送理藩院审理，驻有理藩院司官的地方，则由司官会同当地审理。这就使得中央政府以理藩院为枢纽，织就了一张从中央到边疆卡伦、台站的机构体系，还这一体系的运行和边疆的治理提供了切实充分的法律保障。

参赞戎机，参与中央政府涉及边疆的军政要务决策处置。清代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同时纳入版图，在思想上突破宋代以来的华夷之辨，将“大一统”推进到更高水平，即雍正所称“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因此，清代边疆的军政事务较为繁巨，这些事务的决策与执行都离不开理藩院。

顺治时期，理藩院大臣就已参与边政要务，如达赖喇嘛在觐见顺治帝过程中，迎接、会面乃至册封等重要礼仪，皆由礼部和理藩院共同完成，康熙对班禅的册封，也由理藩院负责。康乾时期，理藩院参与一系列国家军政大事。如“三藩之乱”爆发后，理藩院积极组织漠南蒙古各部兵力奔赴江西、陕西等地平乱。在察哈尔部布尔尼之变发生时，理藩院官员奔赴漠南蒙古各部各旗，调集兵力围剿叛军。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发生冲突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亲往喀尔喀地区，令其“同归于好”。噶尔丹发动叛乱、喀尔喀蒙古各部屡南奔时，理藩院立即上奏康熙帝并负责安排喀尔喀蒙古各部生计。正是在理藩院安排组织下，通过“多伦会盟”，我国北部边疆很快出现了安定局面。理藩院也参与了平定漠西准噶尔蒙古部的全过程，并对平叛中有功官兵的提职和赏赉提出初步建议。

以文化人，承担面向边疆群体的礼仪文教等职能。“怀柔远人，协和万邦”是中华文化的治理智慧，通过对边疆各民族群体在礼仪文教方面的塑造与规范，不断实现并巩固边疆群体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

依清制，如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喇嘛僧侣、新疆伯克、西南土司等边疆地区的首领，皆按规则分班来京朝见皇帝，称为“年班”，其中所涉的各项礼仪、来去安排等均由理藩院负责。朝觐的王公向皇帝呈纳贡物，皇帝则给予隆重礼遇，如除夕设宴于保和殿，元宵设宴于正大光明殿，在中正殿、紫光阁等处安排的宴请等，皆由理藩院预备和奏请，木兰行围活动中随围王公的座次，也由理藩院负责安排。各级封号的边疆首领，皇帝要赏以各种绸缎和银两，即“燕赉”，年班或因事来京，中央政府赏给路程和食宿费用，称为“廪费”。这些代表中央政府恩赏的礼仪，皆依爵位高

清代边疆治理中的理藩院

□ 狄鸿旭

低、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也都由理藩院安排。理藩院还结合礼仪规范，拟定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贵族的适宜封爵，使其世代相袭。“兴黄教”是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文治”形式，相关事务统于理藩院。其中包括登记造册喇嘛呼毕勒罕，主要涉及北京、西藏、青海和蒙古等地的转世活佛的认定。此外，喇嘛承袭国师、禅师、都纲等事，归理藩院承办，并会同礼部，办理请给敕印等事，僧纲、僧正由理藩院给予札付，部分喇嘛的年班、考核、升迁、调补以及奏请寺庙名号等，也由理藩院负责。“礼”是传统中国社会运行的核心准则，边疆地区首领对由理藩院主导所塑造的“礼仪”的接受，既是对其自身的引导教化，也意味着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情感接纳。

抚民绥边，协调推动边疆的社会事业建设。清朝为保障军需等，对蒙古西北等地的农业生产曾给予扶持。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理藩院遣员到漠北蒙古土谢图汗部，“指授膏腴之地，令其种植”。理藩院还多次派人到漠南蒙古地区“教之树艺，命给之牛、种”。农业在漠南蒙古地区的发展尤其明显，往日龙沙雁碛之区，逐渐变得“筑场纳稼，烟火相望”。漠南地区农作物品种丰富且产量较高，有些地区生产的粮食，除供本地区外，还可以运往北京和中原。在此基础上，蒙古各部商业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定期集市出现，商业集镇涌现。漠南、漠北、漠西各地商路上，呈现出商旅云集、贸易兴盛的繁荣局面。蒙古等地遇有荒年，中央政府即令札萨克及各旗富户喇嘛人等设法救济，实力不足者，由地方报理藩院请旨遣官查勘，实施救助。如康熙年间苏尼特及四子部落遭遇雪灾，理藩院会同户部支宣府归化城仓粟给予救济。理藩院还在边疆地区协助组织建立“常平仓”，贮积粮谷，以备赈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挣脱沙俄的残暴统治，从伏尔加河下游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也由理藩院遵照乾隆旨意，协调新疆、甘肃、陕西、宁夏、蒙古各地，提供大批物资，拨给牧地。此外，理藩院还负责一些边疆地区的户口人丁登记查核、驿站通行管理和保障等公共事务。

总之，清朝以理藩院为枢纽，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与“因俗而治”的理念相结合，将边疆地区更好地纳入国家政治体系，实现了长久有效的治理。透过历史不难发现，理藩院是清代为“大一统”提供政治保障的制度设计，也推动着传统中国的“大一统”迈向新高度。



历史研究走向大众，即历史研究成果和知识的大众化、社会化过程。它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历史价值、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历史研究如何走向大众、服务社会，长久以来一直是困扰史学工作者的老问题。

这个老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给予新的释义和解答。往上追溯，中国古代就有形式丰富的历史知识普及和传播，具体而言有历史演义、个人传记、墓志铭等书面传播和说话人讲史等口头讲唱。在当今社会，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历史研究走向大众出现了新的特点，史学大众化的传播途径愈加丰富，网站、微信、微博、短视频等便捷平台让公众参与历史书写和历史知识传播的比重日渐提升，专业史学家垄断史学大众化的局面被打破。

公众对史学传播热情的空前高涨和广泛参与，既为历史研究走向大众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媒体变革新条件下，充分发挥专业历史学者的权威性和严谨性，规避史学传播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内容庸俗、史观错乱、史实谬误等不良倾向，成了当下史学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聚焦时代问题开展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绝非封闭的书斋学问，而是“出乎史，入乎道”的动态实践。它既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

历史研究要走向大众

□ 陈 甜

的考据功夫，又需要“通古今之变”的现实关怀。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问题都源于时代的追问。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历史发展进入新的时代方位，急需历史学家把握时代脉搏，敏锐感受和捕捉时代的变化，从历史学角度回应公众的时代关切和与历史学相关的现实问题。只有与时代相连，与现实社会相通，不断提升历史研究解答时代之间的水平，才能得出公众满意的历史答案，实现历史学学术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换。

创新史学话语表达形式。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传播历史研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服务人民、服务现实的重要方式。我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公众对历史的兴趣和热爱浸透在日常生活中。实物史料、多语种文献史料、历史教科书、通俗历史读物、影视作品等，都是历史研究走向公众的传统史学话语表达形式。当前信息技术及应用的快速迭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催生出史学话语表达形式的更新和发展。历史学家应有服务人民的立场和态度，考虑如何借助新技术调动

公众对历史的热情，实现历史研究更好地向大众传播。

具体而言，历史学者要紧跟公众接收信息渠道的变化，打破教科书、参考书、期刊文章等传统单一的史学话语表达，拓宽表达形式和传播体裁，将视频播客、历史游戏、微博短文等时兴方式，运用到历史研究走向大众的传播途径中来。再者，不断加大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史学话语表达中的运用，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历史。这不仅要要将文献史料数字化转换，还需要加注历史知识、情境想象和演绎推理，通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再现历史场景，将断裂的史料缀缀起来，让公众借助文字、语言和影像，沉浸式体验历史场景。我国现有的大量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历史遗址等丰富历史资源，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展现历史中的人物、物体和场景，以增强历史的感染力、影响力和说服力，让公众体会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重面貌，更好地理解历史、认识历史。

培养面向大众的公共史学专业人才。随着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形态的出现，历史研究走向大众的途径和媒介逐渐丰富。在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媒体平台上，有不少非职业历史学者充当着历史知识面向大众的传播者，他们采用多种传播形式把历史讲得有声有色、津津有味。与之相较，职业历

史学者与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着不小距离。这种现状容易导致真实的历史内容得不到有效传播，历史的解释权和历史学的大众化、社会化职能，容易被某些商业利益者、违背国家根本利益者所攫取和利用，在传播平台上出现历史内容过度娱乐化、历史观错乱、历史史实谬误等现象。

这些现象对历史学者的定位和历史学应用领域提出了问题 and 挑战，即怎样才能把精深的研究应用于大众传播，把优秀史学研究成果面向大众普及开来，将历史知识更好地传播给公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新媒体平台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导机制，职业历史学者不能长期徘徊在公众之外，需要与历史爱好者、社会大众之间构建起联通的桥梁，也即很多学者正在提倡和建立的“公共史学”。现有不少高校开设了公共史学专业培养公共史学人才，他们将是历史研究面向大众普及化的重要桥梁。公共史学人才一方面保障了面向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成果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等现象滋生，有利于公众正确历史观的生成；另一方面他们所具备的面向大众传播的理论水平和社会实践能力，能基于公众兴趣偏好、接受能力、受教育程度等要素，实现历史学者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有利于发扬历史学求真致用的优良传统。